

青年学者深调研

百年变局下奋力书写
AI时代的广东答卷

□刘向洋

“子张之间”的文明之问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底层支撑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

□ 谢茂松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们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是说孔子感叹时光流逝，自己不为世所用。这种解释是对孔子人生态度的一种消极性解释，其实圣人孔子这句话既非伤感个人，其态度亦非消极，而是非常积极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象，传达的是孔子相信中国文明如流水、如大江大河一样永远相续不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传达的是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自信，这是大本大源的文化自信。今日中国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毫无疑问是从新时代来，同时也在本源上从孔子代表的中国文明传统而来。孔子对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自信，更集中体现在《论语·为政》中孔子对于弟子子张之问的回答上。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按今天的说法就是传承，传承的是礼乐文明背后的“道”，即文化精神、文化价值。如果说“因”是传承，“损益”就是发展，是因时而做调整的时中之道，即《礼记·礼器》所说“礼，时为大”。礼作为制度，行之长久，不可避免地生弊，损益就是因时而对具体制度做出调整，但调整的依据还是礼乐文明背后的文化价值。

商周礼乐文明都是对之前文明的继承发展，孔子从这一历史文明逻辑来预言，后世继承西周礼乐文明者，不要说三百年后的中国，就是三千年后的中国都是可以预知的。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面对弟子子张之问，孔子的回答何以如此自信？三千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可以预知吗？

撑，强调“忠”，即忠于国家、朝廷，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天下意识，强调修己治人的内圣外王之道。德性政治、德性社会及二者的高度融合，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奥秘所在。

中国古代的王朝较之欧洲中世纪各王国，为期都更长，政治上都更加先进、稳定。黄炎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乃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入侵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脉络下才会产生的现代问题。近代中国第一次落后于西方，才有古今中西之争以及在古今中西之争下的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

孔子对于弟子子张之问的回答，就是文明论的回答，针对的是中国文明的继承、发展、创新的根本问题。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通过探究商代礼乐文明对夏代的继承、发展与创新，深入理解商代文明特质，又立足当时，剖析周代如何集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大成，深刻把握周代礼乐文明的精髓，进而往后展望、预知未来三千年中国文明。按照古人的说法，一世为三十年，百世为三千年，孔子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孔子之所以自信地说出百世可知，正在于中国文明的连续，在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的连续，也就是“道”与“道统”的连续，即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的连续。

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话时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黄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问毛泽东时，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毛泽东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两人的对话可谓是政与教之间的对话，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也乐意完成了由从事教育转向从政的身份与心态的转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感召。

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话时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黄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问毛泽东时，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毛泽东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两人的对话可谓是政与教之间的对话，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也乐意完成了由从事教育转向从政的身份与心态的转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感召。

针对黄炎培之问，毛泽东的回答

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为延安完全不同于重庆的风气以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一席话所感召，从延安回到重庆后，写下了《延安归来》，其立场由原来的中立而转向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黄炎培在旧中国不愿从政，他1921年被委任为教育总长，却不愿就职。蒋介石好几次请他做官，他也没答应。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晚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其子黄大能对此不解，黄炎培解释了缘由：“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我是为人民做事啊！”

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话时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黄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问毛泽东时，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毛泽东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两人的对话可谓是政与教之间的对话，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也乐意完成了由从事教育转向从政的身份与心态的转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感召。

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话时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黄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问毛泽东时，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毛泽东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两人的对话可谓是政与教之间的对话，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也乐意完成了由从事教育转向从政的身份与心态的转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感召。

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话时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黄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问毛泽东时，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毛泽东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两人的对话可谓是政与教之间的对话，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也乐意完成了由从事教育转向从政的身份与心态的转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感召。

针对黄炎培之问，毛泽东的回答

西方列强入侵，才会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惊呼。

孔子所处春秋时代，西周礼乐文明受到冲击、挑战，一方面是内部出现礼坏乐崩即文明失序，另一方面是外部四夷侵扰，“中国不绝如线”（《春秋公羊传》），孔子由此表彰齐桓公、管仲的“尊王攘夷”策略，肯定其在军事、政治上保护中国文明之功绩。但保护中国文明光有军事、政治还是不够的，需要军事、政治与文化即政、教两端同时用力。孔子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揭示西周礼乐文明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即“仁”，另一方面是系统整理、诠释《五经》，并以“仁”之文化价值观一以贯之。孔子以经学诠释为基石，构建起稳固的中国文明意识形态框架，为一大统国家的凝聚奠定了精神根基。其后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五经博士及其子弟员，儒家以及《五经》由此成为历代的指导思想，并通过考试选拔将政治与社会全然贯通。

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面临着当时的“古今之变”，他所做的工作是在春秋礼坏乐崩，也就是文明失序时，重建文明秩序、价值秩序。孔子所做的工作关乎的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乃是“道”的连续，而由《五经》形成的经学，正是通过经学文献及其诠释来承载“道”和“道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们对于孔子这句话的理解，往往是说孔子感叹时光流逝，自己不为世所用。这种解释是对孔子人生态度的一种消极性解释，其实圣人孔子这句话既非伤感个人，其态度亦非消极，而是非常积极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象，传达的是孔子相信中国文明如流水、如大江大河一样永远相续不断。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一些隐蔽性强、涉及面广、影响恶劣的“微腐败”现象仍然存在。

黄炎培、毛泽东二人对话时的身份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黄炎培早年是革命志士，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问毛泽东时，他的身份是教育家尤其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毛泽东的身份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政治家。两人的对话可谓是政与教之间的对话，而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也乐意完成了由从事教育转向从政的身份与心态的转化，正如他回答其子的疑惑，他完全是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感召。

针对黄炎培之问，毛泽东的回答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与党的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完全是一体的，一方面，二者共同构成内外约束，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本身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构成了现代中国的新政治秩序，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就无法以其先进性、以其高度觉悟来组织动员人民，也就没有了代表性，而不成其为共产党，正如孔子所说“必也正名乎”。同样，中国人民如果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旧中国一样的一盘散沙，也不成其政治学意义上组织动员起来的人民。

从某种意义上说，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代表的是社会，第二个答案代表的是政治。社会与政治之两端也就是中国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奥秘，在于德性社会、德性政治的连续。人民监督、人人都负责，正是德性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发展。

党的自我革命则是德性政治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传承发展。中国共产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党纪严于国法，强调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强调共产党员的心学，强调党员的修养，共产党员的心学之“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心，共产党员的心学之“学”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学。

跳出历史周期率，也就是保持中国文明传统所说的“可大可久”，其中有中国现代的新“可大可久之道”。黄炎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问，关键的是政治秩序的问题；两千五百多年前子张之问的文明之问、文明连续性之问，关键的是文明秩序的问题，而政治秩序的根本保障与底层支撑在于文明秩序。所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底层支撑是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由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生的黄炎培之问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子张之问，二者得出了内在统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产生的古今中西之争得到破解。

孔子回答子张之问，解读周代文明是对夏、商文明的传承发展。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温故而知新，需要有子张之问，孔子之答的文明连续性的自觉意识，来真正全面、深刻地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新时代。为此，需要全面、通贯地理解七十年新中国史、百年党史，还要理解中国现代史、中国近代史；进而再往上理解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史，三千多年前的西周礼乐文明；还要溯源而上理解五千多年前的中国文明，这就是通史之为通史的上下节节贯通的“通识”所在。今天的中国道路是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中而来，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

（作者系中国国创会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国际视野：抢抓国际数字贸易规则重塑的契机

今年2月，人工智能行动峰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吸引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名参会者。包括法国、中国、印度、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签署了《关于发展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地球的声明》，倡导加强全球人工智能协调治理，承诺推动“开放、包容、透明、合乎道德、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发展。

广东作为中国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关键窗口，亟须在三个层面实现突破：一是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方面嵌入“湾区方案”，积极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探索具有大湾区特色的跨境数据流动模式，为全球跨境数据治理提供可借鉴的范例；二是构建与国际接轨的AI伦理评估体系，通过大力支持鹏城实验室、广州人工智能试验区、建设算法治理开放平台，通过与国际接轨的评估体系，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符合伦理规范，提升广东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三是深化“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要充分发挥腾讯、华为等龙头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影响力，积极推动其输出智慧城市、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数字合作，拓展国际市场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作为数字经济大省，广东要紧紧抢抓国际数字贸易规则重塑的契机，在人工智能领域率先发力，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制定，充分发挥制度规则的引领作用。2022年11月1日，全国首部人工智能产业专项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实施，提出创新产品准入制度，对于国家、地方尚未制定标准但符合国际先进产品标准或者规范的低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允许通过测试、试验、试点等方式开展先行先试。2024年10月，全球数据源中心（中国·南沙）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数字经济公共基础设施，该数据源中心将汇聚物品的全生命周期数据，在数据要素流通、数据权益分配、产业开放生态、数字治理创新等方面形成领先示范。这些有益实践，正在将广东的探索经验转化为全球数字治理的“通用语言”。

区域竞合：在人工智能赛道上开辟特色化创新路径

在琶洲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来自中国杭州的人工智能企业深度求索（DeepSeek）凭借其开源、低成本和低能耗设计，展示了中国在AI领域的创新能力，为全球AI普惠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事实上，浙江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的进阶之路为广东提供了重要参考。杭州依托之江实验室打造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平台，宁波高标准推动行业大脑建设，折射出“平台赋能+场景驱动”的转型逻辑。浙江通过实施“一号发展工程”，发挥数字经济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更好赋能产业发展，实现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而广东的竞争优势在于“四个90%”的独特生态：约90%的科研机构、90%的科研人员、90%的研发经费、90%的发明专利申请来源于企业。这种市场主导的创新体系，让广东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坚实的产业基础和多样化应用场景。

根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报告（2025）》显示，广东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实力、市场份额等位居世界前列，其中深圳、广州两市在全球人工智能最具创新力城市中排名前五十。广东在群体智能、类脑智能、具身智能、人机混合智能等前沿领域以及无监督自然语言处理、群体自主无人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安全技术等关键共性技术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人工智能技术在更多复杂和特殊场景下的应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截至2024年10月31日，全国“人工智能”组织机构已达近190万户，其中广东地区以近28万户的规模领跑全国，占据全国总量的14.7%。这不仅体现了广东作为全国科技创新高地的地位，更折射出其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产业变革的强劲势头。目前，在AI芯片、大模型、智能传感器等关键领域，广东已形成“点一线一面”突破态势。

着眼未来，一方面，广东需要通过《广东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若干措施》政策指引，夯实人工智能产业链底座，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构筑智能终端产品新高地，塑造广东品牌新形象；打造智能融合应用新引擎，形成经济增长新风口。另一方面，广东可以积极推动构建粤港澳协同创新网络，加强区域间的创新合作与交流。

站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重构的历史关口，描绘广东数字治理新篇章，需要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更具胆识的革新魄力和更加主动的担当作为。广东唯有优化营商环境集聚天下英才，以制度创新破除要素流动壁垒，用场景开放加速技术迭代升级，才能在全国、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中更好地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简介：刘向洋，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强化新时代高校廉洁文化建设 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

□刘少萍 李富国

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绘制了发展路径，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以系统思维谋划布局，以久久为功的定力推进落实。

在高校这一人才培养和思想建设的特殊场域，廉洁文化彰显出独特而深远的价值意蕴：其一，它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净化剂。培育廉洁文化能够从思想源头上涤荡滋生腐败的尘垢，涵养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其二，它是青年学子人生航程的压舱石。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廉洁文化的浸润能够帮助他们明辨是非、守住底线。其三，它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将廉洁理念融入学校各项管理制度，能够提升治理效能，规范权力运行。

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之际，高校更应深刻思考如何践行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时代要求，将廉洁理念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落实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从课堂教学主线到日常管理服务，从教师言传身教到校园文化熏陶，构建多维度、立体化的廉洁教育体系，为青年学子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要着力培养既掌握过硬专业知识，又具备坚定政治品格的新时代人才，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真正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时代重任。

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导向的文化形态，廉洁文化始终秉持崇廉拒腐的核心价值追求。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沃土，赓续了清正廉洁、诚实守信、公正无私的精神血脉。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

从表现形式看，高校“微腐败”现象具有三大特点：一是行为上的隐蔽性，“微腐败”行为往往披着合理外衣而悄然滋生。例如科研经费中混杂私人消费的“蚂蚁搬家”式侵占，或将超标消费包装成必要的学术开销。二是手段上的“专业性”，高校作为知识密集型组织，其腐败行为往往带有鲜明的学术烙印。例如借科研协作、成果转化之名行利益输送之实，或利用评审权进行利益交换。三是主体上的扩散性，“微腐败”“微特权”现象已从教职工向学生群体蔓延。这些看似微小、模糊的违规行为，如不能得到及时治理，极易演变为系统性风险。其中，隐蔽性增加了发现难度，“专业性”提高了查处门槛，扩散性扩大了影响范围，三个特征相互交织、相互强化，构成了高校“微腐败”行为的典型样态。

当前高校廉洁文化建设面临着种种挑战，其根源在于多重因素的复杂交织。从思想认识层面来看，部分党员干部和任课教师对廉洁文化的内涵理解仍显不足，将之简单地与纪检监察等业务工作上等号，忽视了其作为育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深层价值。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重业务指标、轻思想引领的倾向，使得廉洁文化建设往往流于表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教师存在“学术至上”观念，将学术成果与个人品行修养割裂开来，为放松自我约束提供了思想温床。

制度建设滞后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首先，廉政风险防控机制未能与高校其他领域的快速发展实现同步。特别是对科研经费、招生录

取、基建工程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管理还存在盲区，制度设计的漏洞使得“微腐败”行为在缝隙中滋生蔓延。其次，高校内部监督力量分散，部门间协调不足，难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合力，师生参与的不足也限制了监督的广度和深度。

知行合一：

谱写高校廉洁文化新篇章

为推进高校廉洁文化教育入脑入心，要涵养浸润式、全链条的育人生态，实现校师生从认知认同到实践养成的质变跃升。要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精髓，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高校特点的廉洁文化理论体系。特别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规律的研究，避免简单说教，真正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文化人。

制度保障是实现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的重要支撑和根本保证。要立足高校实际，建立健全与现代大学治理体系相适应的廉政制度规范。一方面要完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将廉洁要素嵌入招生录取、职称评聘、基建招标、物资采购等工作的各个环环；另一方面要强化制度执行的刚性约束，构建纪律监督、审计监督、民主监督协同发力的监督体系。既要要有“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又要要有“不敢腐”的惩戒机制，更要有“不想腐”的保障机制，从而形成系统协同的制度闭环。同时，要建立健全廉洁文化建设的考核评价机制，将廉洁文化建设成效作为党建工作考核和领导干部述职评议的重要内容。

文化浸润和实践养成是廉洁文化落地见效的关键环节。要创新廉洁文化的表达方式和传播载体，打造具有高校特色的廉洁文化品牌。既要注重发挥传统教育方式的优势，又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技术拓展传播渠道，增强廉洁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搭建多样化的实践平台，通过开展主题鲜明、形式新颖的廉洁实践活动，促进廉洁理念向行为习惯的转化。要特别重视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以上率下、层层传导的良好局面。

廉洁文化建设是一项春风化雨、固本清源的系统性工程。高校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重要阵地，必须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廉洁文化建设的核心轴线和精神养分，聚焦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目标，以“制度约束+文化浸润”双轨并进。一方面要把精简会议活动、厉行勤俭节约等具体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监督的行为准则，形成刚性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所蕴含的务实理念和清廉价值有机融入师德师风建设、课程思政改革和校园文化活动，使其成为办学治校的实践基因。唯有通过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教师群体言传身教、青年学生积极践行的全员协同，高校才能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为党和国家培养既具专业素养、更有廉洁底色的时代新人，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精神支撑。

作者简介：刘少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李富国，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